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ILI NENGLI
XIANDAIHUA YANJIU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 现代化研究

赵成斐 吴 刚 著

红旗出版社

本书是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6JD30）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 现代化研究

赵成斐 吴 刚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 赵成斐，吴刚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7-5051-3986-2

I. ①中… II. ①赵… ②吴… III. ①中国共产党—
执政—研究 IV.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8153 号

书 名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著 者	赵成斐 吴刚		
责任编辑	赵春霞		
装帧设计	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发 行 部	010-57270296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印 张	20.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1-3986-2	定 价	56.00 元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联系电话：010-84026619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的现代化	11
一、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推进党的现代化	12
（一）民主集中制的溯源	12
（二）“民主集中制”两种文本校勘	19
（三）民主集中制的现代性输出	23
（四）对民主集中制的范式解读	25
二、党内组合式民主创新与发展	29
（一）党内组合式民主发展背景	29
（二）党内组合式民主创新模式分析	31
（三）党内民主创新发展趋势分析	37
三、增强党内程序民主中“授权”，消除其“空转”	40
（一）程序民主中“授权”的逻辑	41
（二）民主的过程主要是“授权”的过程	45
（三）程序民主中“授权”的保障机制	48



(四) 党内民主选举程序显现出“空转”问题	51
(五) 党内选举程序存在“空转”的缘由分析	56
(六) 党内民主选举程序“空转”的破解策略	60
四、促进党内“确认型选举”与“竞争性选举”对接与兼容	65
(一) 党内“确认型选举”与“竞争性选举”的状况分析	66
(二) 党内“确认型选举”存在的问题	69
(三) 党内“竞争性选举”的可行性与突破性	73
(四) 党内“直接选举”与“差额选举”发展状况	78
(五) “确认型选举”与“竞争型选举”的衔接与融合	84
第二章 促进党内选举与协商民主良性互动	90
一、党内协商式选举的路径探索	90
(一) 党内“协商式选举”的内涵及特征	92
(二) 党内“协商式选举”发展的前提、关键与原则	95
(三) 党内“协商式选举”路径探索	100
(四) 党内“协商式选举”的前瞻及反思	103
二、党内“公推直选”的制度供给能力及协商效能	106
(一) 党内“公推直选”的内涵及其发展沿革	106
(二) 增强党内“公推直选”中的民主协商效能	109
(三) 提升“公推直选”制度供给与民主协商能力路径	113
三、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双向逻辑演进	119
(一) 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及价值取向	119
(二) 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双向互动演进	124
(三) 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性表现	128
(四) 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协同机制分析	135
(五) 完善基层党内选举与协商民主机制，增进共识	138
第三章 加强党的适应性变革，提升治理能力	141
一、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定位	141



(一) 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的移植与生成	142
(二)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介入与定位	145
(三) 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调整与政党能力再造	149
二、加强执政党在特色政党制度中调适性能力建设	153
(一)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主体间状况分析	154
(二) 拓展党际和谐空间是政党主体间调适的基础	156
(三) 严格遵守宪法和有关程序是政党主体间调适的关键 ..	157
(四) 协商民主之路是政党主体间合作的根本性路径 选择	159
第四章 加强党的话语软实力, 提升其领导力	162
一、执政党话语的调整与转化能力	163
(一) 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政党话语诉求	164
(二) 文化软实力视域中党的话语结构特征及其转化	166
(三) 文化风险境遇下执政党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169
(四) 加强党的话语能力建设, 提升其文化软实力	173
二、多元舆论场中执政党的舆论引导能力	178
(一) 多元舆论场的形成与内涵	178
(二) 多元舆论场中的表达与传播特征	181
(三) 多元舆论场对执政党的舆论引导能力造成影响	185
(四) 多元舆论场中提升执政党的舆论引导能力的策略	190
三、促进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元主导”与“多元共存”	196
(一) 意识形态的党派性态度分析	197
(二)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范式的变迁	199
(三) 由革命的逻辑到规范的逻辑	204
(四) 意识形态范式变迁带来的启迪	206
第五章 提升党的治理能力, 化解执政风险	209
一、后危机时代中党的治理策略与路径	210
(一) 后危机时代政党的生存境遇	211



(二) 后危机时代政党变革与治理能力	214
(三) 要与时俱进地重塑政党形象	220
二、风险境遇中政党治理能力的再造与提升	221
(一) 风险社会对政党治理能力的挑战与影响	222
(二) 风险境域中政党替代性治理模式的建构	226
(三) 风险境域中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的突破与调整	229
三、政治新常态下加强对“山头主义”的治理	233
(一) 政治新常态下“山头主义”的风险性危机	233
(二) “山头主义”形成的轨迹、原因及实质	237
(三) 当前“山头主义”的表现及特征	239
(四) 清除“山头主义”的对策与路径	240
第六章 增强执政党的现代性, 促进其能力建设	245
一、从政党“移植”到本土化政党建构	246
(一) 政党政治的缘起: 士绅阶层瓦解与知识分子转向	246
(二) 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与中国式政党的产生	249
(三) 模仿的现代性与中国政党的现代性试错	252
(四) 本土化政党的开启与现代性自觉意识	254
二、中国共产党现代性探索的深层解读	259
(一) 解放政治: 革命现代性的探索	259
(二) 中心主义与边缘意识	263
(三) 对整体性革命的现代性诉求	269
(四) 革命范式的转向与规范逻辑的累积	271
三、自觉践行党内政治规矩,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	275
(一) “党内政治规矩”: 党内政治生活的鲜明主线	275
(二) 对党内政治规矩内涵的理解与认知	278
(三)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 关键在于践行党内政治规矩	289
四、全球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现代性”与“民族性”双重 建构	295



（一）政党发展的两种向度：“现代性”和“民族性”	296
（二）“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是中国政党执政的 基本价值取向	299
（三）全球化时代加强“现代性”与“民族性”双重建构 ...	302
参考文献	306



导 言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接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理论依据、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并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一总目标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价值追求等重大问题，为全党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前进的目标与奋斗的方向。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推进国家现代化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一项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提升其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全新的执政理念，也是其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与新判断，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政党理论的重要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掌握着最核心、最关键的政治权力，其自身的改革、调整与转型是影响中国现实政治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变量。中国共产



党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政治主体，其本身的能力、素质及经验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我们党自身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将促使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进一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是党执政的最重要能力，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与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加科学、依法、民主执政，提升执政能力，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关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方面的重大战略问题。在 1999 年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 年）专门提出了“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①，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大历史命题得以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把自身如何执政升到党的建设的高度。从此，党的领导制度和国家治理制度的改革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 重大命题。在这里提出的“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以国家、政党和社会治理体系为依托，借助制度、机制、政策、技术等因素，促使国家、政党和社会治理能力保持协调进步、务实高效的一种趋向与动态过程。在国家、政党和社会治理三重维度中，政党治理能力是关键，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必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科学化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版，第 6 页。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版，第 18 页。



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百年老党、大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走向败落，有的甚至遭受土崩瓦解，其中主要缘由之一是没有与时俱进提升自我执政能力，没有很好地引领国家与社会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制度建设是国家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根本保障。面对全球化与信息化复杂多变的国际与国内形势，要积极主动应对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时任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与“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始终摆在全党面前。这“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振聋发聩，值得全党同志警醒，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一名党员干部都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要时刻面对政党、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高度重视党情、国情和民情的变化，要生于忧患，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一以贯之的自觉意识。历史和现实发展实践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艰难，保持长期执掌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更不容易。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特别注意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四个自我”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新大变化，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突出了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要求。新的党内生活准则突出了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等内容，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着重解决当前一些党委和组织中党内政治生活出现的庸俗化、随意

化、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党内监督、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发展方向是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利益。但现实生活中，受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制约，作为党的细胞的党员有自己的具体利益。在新的情况、环境与形势变化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当前和今后一个工作重心就是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只有不断完善好优化党的各项制度建设，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党的独特优势科学有效转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活力，形成发挥党的独特优势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协同推进机制，才能有序有力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12日，该文发表在《求是》2014年第1期）一文中



指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同时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以来，一直不断坚持改革创新，形成了许多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的有效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但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有效的治理机制，还要根据全球治理发展的形势、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继续拓展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形成党的独特优势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不断地完善和变革中保持治理机制的效力与活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执政方式，提升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需要把党的制度建设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位置，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监督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工作本领，提高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效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保障。国家和社会治理建设，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推进。因为治理体系是个复杂的系统，涉及道路、理论和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独特优势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互促同进，充分发挥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由此看出党的自身制度改革与完善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宏伟任务。

在现代治理条件下，治理结构逐渐由原来的一元单向转向多元交互共治。无论是政党、政府、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必须正确把握自身在

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树立共同治理理念，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更要自觉地加强适应性变革，提升治理能力。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进程来看，衡量一个政党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以下几个主要判别标准：

第一，政党执政是否充分享有充分的民意基础。也就是政党在执政中拥有的公共权力是否获得广大民众认同与支持，是否经过规范的授权方式获得；第二，政党掌握的公共权力是否以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式运行，这就要求政党在治理过程中拥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第三，政党的民主化执政，即政党在治理过程中以及制度安排中必须充分体现出主权在民原则。政党执政的理念、政策与方针等必须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第四，政党的法治化执政，即政党在治理过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把崇尚法律作为治理的最高权威，积极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第五，政党的科学化执政。即政党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中，能够持续为社会秩序和稳定提供有效支持与保障，促进社会持续地和谐稳定发展；第六，政党的领导与协调能力。政党的治理体系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能够为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为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提供科学有效的协调与领导能力，能够统筹治理中的各种制度的相互协调性。

把党的治理能力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来思考和把握，这是我们党对自身建设的深入拓展和推进。加强党的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党的治理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中心，如果不能提高，整个国家治理能力也难以提高。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快速推进，如何做好党的治理能力创新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重要课题。本书稿围绕党的治理能力这个中心进行思考和研究，主要从六个章节论述其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章：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的现代化。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增强党的创新能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推动



党内民主发展的实践探索中，一直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民主集中制”作为政党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与政治主体、政治合法性、权利和权力存在关联，而且与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存在密切关系。在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中，要重视推动党内组合式民主探索，促进党内民主与协商民主协调性发展，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兼容，以此拓展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空间。在推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还要注意在民主程序中“授权”。民主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授权”的过程。“授权”得以顺利运行，要依靠系列的程序公开、优先、广泛参与和公平竞争等原则为其提供保障与支持，以消除民主程序存在的一些“空转”问题，切实保障广大党员和民众权利得到落实与保障。党内选举制度是健全党内民主的一项基本制度，既是反映党内民主发展程度与状况的重要尺度，也是影响党内民主健康生态的基本要素。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内选举制度建设中，着力推进党内“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等额选举”向“差额选举”转变，稳步有序地扩大党内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以及党内差额选举的“比例”和“范围”；保障广大党员的政治参与，突出其“权利主体性”，进一步彰显民主政治的竞争性、参与性、平等性、透明性与公正性等精髓与品质。从党内“确认型选举”与“竞争性选举”发展现状来看，在增强党内“竞争性选举”的突破性建设，以弥补“确认型选举”的缺陷与不足的同时，还要着力推进“确认型选举”与“竞争型选举”两种选举方式的衔接与融合，以深化和丰富党内选举，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良好发展。

第二章：促进党内选举与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也为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指明了一条路径。近年来学界也开始把党内“协商民主”与党内“选举民主”看作党内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并积极探求两者的协同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一致性的价值取向；认为发展党内“协商式选举”在推进过程中注重“横向”与“纵向”的结合、决策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同时注重矫正各种价值偏

好，诉诸广泛民意，为票决提供充分的理性。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不仅表现出党内民主发展的一种主要形态与方式，同时也构成了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两种民主模式在政策、程序、价值目标与责任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依存性与协同性；在发展的“层次性”与“梯度性”方面，在“刚性规约”与“柔性治理”等方面起着相互促进与支持的作用。积极深入推进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协同发展，有利于拓展党内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促进党内共识。

第三章：加强党的适应性变革，提升治理能力。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在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逐渐构成具有中国特质与气派的新鲜经验，并不断赋予中国经验与特色。在“国家—社会”关系中，随着中国政党的介入与定位，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调整与范式转向；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优良排序和相互增权的发展趋势。需要我们从社会功能转型视角分析中国政党结构功能的现实境遇，社会变迁与政党自身变革的内在逻辑关系。面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政党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增强其适应性变革要求。尤其是根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进行变革与创新，各个政治主体之间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依据有关法律程序，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就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坚持走平等、协商民主之路；积极加强和拓展主体际之间合作、协商与共处；拓展政党制度中各个政治主体间和谐空间。

第四章：加强党的文化软实力，提升领导力。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其次是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



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能力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文化发展的需求作出了与时俱进地调整和转化，实现了由过去的“革命”到“建设”，再由“建设”到“改革”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与互促共融。在新时期，随着社会舆论场中舆情传播与表达表现出的“多样化”、“碎片化”以及多元文化之间相互激荡与博弈，复杂多变的舆情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舆论场演进的明显趋势。舆论场中的“泛社会化”、“倒逼”与“越位”等舆论现象对执政党的舆论引导力造成一定的挑战；针对这些挑战，尤其要积极加强执政党的舆论引导能力，特别重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所持的党派性态度，注重根据现实发展进行调整，而不仅仅拘泥于形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原则性同时，又注意策略的灵活性；从执政时期采取舆论一律的宏大叙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革新式建构，再到全球化时代的“一元”主导与“多元”共存以及新时期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尤其在全球治理中，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其主流意识形态范式随着时代发展要求进行自觉调整与变迁，目的在于引领社会和谐共容与发展。

第五章：提升党的治理能力，化解执政风险。风险社会中存在的时空延伸、压缩和交错与剥离等特征，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生活、行为方式都带来巨大的影响。把政党政治置于风险社会中去考量，是人类化解风险的一个重要路径与维度。在风险境域中，一些发达国家的主流政党纷纷陷入生存困境：政党的社会治理方法缺乏有效性，治理能力下降，政党之间缺少稳定的政治联盟，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受到冲击，政党输出的政策与纲领饱受民众质疑。西方一些主流执政党一方面积极探索联合执政模式，加强多元治理，以适应社会变迁；同时还积极开展自我纠错与价值“增值”取向，着力推动社会建设，以创建更加平